印笼里的玲珑世界

浅谈古代便携药文化的东传与变迁

姜姗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国人研究员、北京协和医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医学交流史、医学物质文化史、针灸理论

印笼是盛行于日本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江户时代的小型盛药容器。这种玲珑物件隐藏了一段复杂而有趣的医药交流史话。这一本源自中国的文玩，到了日本辗转成了医药的盛具，而后又「衣锦还乡」，成为清代宫廷帝王的爱用品。透过印笼的有趣的物质文化交流史，不仅显现出古代人们对于保持身体康健的智慧与信念，还能看到承载其中的更为丰富的中国古代医药文化，并处处可见其对日本的影响，以及与其他国家交流往来的故事。



清宫浩瀚藏品中，向来不乏奇技淫巧之物。从珍宝馆无数金银珠宝的日常装饰，到钟表馆八方来朝的实用器具，处处显现出明清两朝帝王对匠人灵巧造物的推崇与喜爱。其中有一种玲珑物件，时而在清宫漆器、海外交流等不同类目的故宫特展中现身，却又鲜有关注，这就是「印笼」。正是这种小小盒子，隐藏了一段复杂而有趣的医药交流史话。

清宫里的东洋便携医药箱

印笼，盛行于日本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的江户时代，通常为长约十厘米、宽约五厘米、厚约三厘米的小套盒，一般有一层至五层不等的设计款式。从现存的印笼藏品来看，其材质多样，以附着精美莳绘的漆器最多，其次有金、银、铜等金属制品，或有陶瓷烧制，亦有用竹、象牙、玳瑁等材料雕刻而成。

目前普遍的说法认为印笼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器物。从其沿用的名称即可看出，早先的印笼应是存放印章与印泥的多层小盒子。到室町时代（一三三六年～一五七三年），日本人开始把这种盒子设计成挂在腰间的样式，其用途十分多样，可以收纳钱币、烟、香粉、药等各种小物件；到了室町末期（约十六世纪），印笼才开始成为以放置药品为主要功能、挂在腰间的容器。（［日］服部



明治时代　樱枫纹莳绘印笼（正、背）
长八・二厘米　宽六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江户时代　红叶樱纹莳绘印笼（正、背）
长八・二厘米　宽五・五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江户时代　人物纹朱漆印笼（正、背）
长八・四厘米　宽六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江户时代　蝉纹莳绘竹鞘印笼
长六·三厘米　宽三·九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明治时代　龟形木雕印笼（正、背）
长九厘米　宽六·一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江户时代　柳虎牙雕印笼（正、背）
长八·四厘米　宽四·七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江户～明治时代　彩绘雪松纹陶印笼
长八・二厘米　宽六・二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昭《印篭と薬：江戸時代の薬と包装》，風詠社，二〇一〇年，页三三）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从现存历史图像及文献材料中可以看出，作为物质文化的印笼，有三方面的实际用途：其一，是作为盛装药物的容器，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其二，在描绘武士及城市里的商贾巧匠们的画面中，印笼作为一种服装的配饰出现；其三，印笼还是一种人情往来的礼物。而印笼作为药物容器的功用一直贯穿在江户时代的二百余年历史中。（[日]服部昭《印篭と薬：江戸時代の薬と包装》，页一七～一八）

标准的印笼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多层的小盒子是印笼的主体，绳子从印笼两侧的孔穿出来，由称为「绪缔」的小珠子并为一股，末端多附着一个与印笼主题相呼应的雕刻件，称「根付」，其作用是卡在腰带上方以别住印笼，底下余出的绳子则多打成精美的饰结。如此一来，向下滑动绪缔时，印笼各层之间就被锁紧相合，不易分开。加之漆器本就有一定的防潮密封的作用，从而使印笼成为理想的储物道具，无论药丸、药粉，还是香料、烟草，都可以干燥清爽地存放其中。

随着佩戴印笼时尚的流行，印笼在形制上也愈加多样，富有创意。形状已不限于长方，也有椭圆、多边形甚至圆形等多种设计。此外，从中国历史典故，到日本特征性装饰、纹样；从自然界的动植物，到民间流传的虚构神怪，都可以成为印笼及其根付的主题图案来源。现今留存于世界各地的印笼文物已是不可胜数，其奢华程度令人惊叹。可以想见，这些贵重的印笼或曾是古代日本贵族武士阶层标榜身份的象征。也正因其瑰丽如此，才会成为日本与其他国家通商往来之时备受推崇的名产品。

印笼的种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解释了接下来更为有趣的事实——这种精致的东洋逸品竟也出现在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清宫旧物之中。由于印笼主要以蒔绘漆器居多，曾作为「洋漆」制品之一种，经由中日贸易商船进口渠道，辗转成为供奉宫廷的贡物。清宫印笼的收藏地点以养心殿——自雍正皇帝以来成为皇帝的居所——为主。而雍、乾两位皇帝对洋漆制品极其热衷，甚至命人制



江户时代　唐草镶嵌印笼
长三·三厘米　宽五·八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明治时代　古墨意匠印笼（正、背）
长七·三厘米　宽五·五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江户时代　木鱼形印笼
长六·四厘米　宽六·七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江户时代　犬纹莳绘印笼（正、背）
长八·八厘米　宽四·八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江户时代　马纹螺钿莳绘印笼（正、背）
长八厘米　宽五·一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作了大量仿洋漆物品。（夏更起《故宫博物院藏「洋漆」与「仿洋漆」器探源》，《故宫博物院院刊》二〇一五年第六期）具体到印笼来说，据笔者目前考察，两岸故宫藏有日本制作的印笼至少七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五件，文物号分别为故漆〇七・一一・〇〇〇五〇二、五〇三、五〇七，故漆〇七・〇〇・〇〇五〇一、五〇八；故宫博物院藏两件，文物号为故〇〇一三五六九九－六一／六五、新〇〇〇五七一〇五），且现存尚有至少两件雍正年间清宫自行制作的「铜胎画珐琅黑地彩云纹穿带盒」（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形制工艺上与印笼高度相似。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清宫日本漆器特展的图录中，作者陈慧霞也曾提到雍正皇帝因对日本精巧漆物的喜爱，特令「照样或烧造黑珐琅盒或做漆盒」（陈慧霞《清宫时绘：院藏日本漆器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二〇〇二年，页一〇），足见当时皇帝对这些来自东洋的印笼的热衷。

这一本源自中国的文玩，到了日本辗转成了医药的盛具，而后又「衣锦还乡」，成为清代宫廷帝王的爱用品。事实上，透过印笼的有趣的物质文化交流史，我们还能看到承载其中的更为丰富



十七～十九世纪　水渚城池莳绘印笼
长七厘米　宽五・五厘米　高二・一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十七～十九世纪　水渚城池莳绘印笼
长六・八厘米　宽五・一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十七～十九世纪　菊篱莳绘印笼
长九厘米　宽六・五厘米　高二・三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十七～十九世纪　填漆椭圆盒
长五・八厘米　宽三・二厘米　高五・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十七～十九世纪　金漆嵌螺钿孔雀牡丹图印笼及款识
长二五厘米　宽一一・二厘米　高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铜胎画珐琅黑地五彩云纹穿带盒
长一三・三厘米　宽九・五厘米　高三・八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洋漆制品极其热衷，甚至命人制作了大量仿洋漆物品。此件即为雍正年间清宫自行制作的，其形制工艺上与印笼高度相似。

的中国古代医药文化，并处处可见其对日本的影响，以及与其他国家交流往来的故事。

打开印笼：随身常备的「救命仙丹」

在江户时代印笼文化鼎盛时期，其作为药物盛具的功用已然比较固化。那么，打开印笼，其中究竟常备着什么样的药不禁令人感到好奇。如此流行的印笼固然会在各种形式的历史纪录中留下印记，在日本古代绘画、文献、文学故事里确可看到印笼的踪影与线索。有研究者根据江户时代有关印笼的历史文献，总结出几种有明确记录曾被放在印笼中的口服药物，这些药物都是在当时容易购得的调合药，类似于遵从固定组方制作的中成药。有时，印笼里也会放置外用涂抹的膏药或药粉。根据研究者的考证，这些口服的药物以丸剂为主，包括延龄丹、银益丹、苏香圆、万病圆、透顶香等。其中延龄丹和苏香圆可用于治疗神昏（或神志丧失）、咳嗽；万病圆可治疗腹痛；透顶香则是一种用于防口臭的口腔清凉剂。（［日］服部昭《印篭と薬：江戸時代の薬と包装》，页二〇～二一）此外尚有银益丹，又名「流珠白云丹」，应是一种与金益丹相似的药物，而金益丹别名「不老不死丹」，也是一种在当时深受人们喜爱的灵丹妙药（［日］伊濑仙太郎《社会科の友叢書の一五：中国と日本》，世界社，一九四九年，页八八），据传有延缓衰老的保健作用。

印笼在功能性质上类似随身的小包，因而其中盛装的药物多为出门在外的常备药品。而能被明确记录在历史文献中的印笼装配药，则更应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效果甚佳的药物。有趣的是，前述这些药丸，实际上大多是基于古代中医典籍载述加减而成。日本的传统汉方药从理论到材料，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古代的医药知识。早期流入日本的《黄帝内经》《伤寒论》奠定了汉方医学的理论基础，而后随着《千金方》《新修本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越来越丰富的医书的流传普及，日本汉方医学的知识体系基本成型。尤其是《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几乎可以视为后世中成药、汉方药的根基。早期的中国医书经由商贸或僧侣交流的途径被带入日本，而反过来，中国亡佚医书也逐渐从日本回流。如清代杨守敬《日本国访书志》记载了中国古籍三万余卷，其中即有大量医书，后于民国入藏故宫博物院。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纪念展（即二〇〇二年五月至十月在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城楼上展出的《故宫藏日本文物展》）中，就曾展出故宫所藏一七三二年和刻本《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故宫博物院《故宫藏日本文物展览图录》，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页三二、一〇八）而这些收纳于印

阅读链接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太医局奉诏广征民间验方编纂的一部包括内、外、妇、儿各科的权威性方书，既是当时药局的制剂规范，也是宋以来最有名的成药处方配本，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方主持编纂的成药典。全书共十卷，分为治诸风、治伤寒、治一切气、治痰饮、治诸虚、治痼冷、治积热、治泻痢、治眼目疾、治咽喉口齿、治杂病、治疮肿伤折、治妇人诸疾、治小儿诸疾等十四门，载方七百八十八首。所收方剂记述了其主治、配伍及具体修制法，是一部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临床方书。许多方剂都是民间常用、确有临床实效的“经验方”，如四物汤、四君子汤、醒消丸、至宝丹等，作为成方规范沿用至今。



清　补注黄帝内经
故宫博物院藏



清　伤寒撮要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故宫博物院藏

笼中的丹丸药物，即是在中国古代医书记载的基础上，日本人进行加工改造制作而成，因而有些还沿用了旧时的名称。

如前文提到用于治疗腹痛的万病圆，较早收录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八中，是「杂病」类目下的首方，全名「耆婆万病圆」。根据原书中的载述，万病圆所能治疗的疾病甚多，颇有「万病悉除」的意味。方含牛黄、黄芩、芫花、禹余粮、雄黄、川芎、人参、紫菀、蒲黄、麝香、当归、桔梗、大戟、干姜、防风、黄连、朱砂、犀角、前胡、巴豆、细辛、葶苈、肉桂、桑白皮、茯苓、芍药、川椒、甘遂、芫青、蜈蚣、石蜥蜴等三十一味药，研为细末，与炼蜜和匀，做成如小豆大的药丸。~《官刻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下册）》，燎原书店，页五〇七~五〇九~万病圆的组方传入日本后很受欢迎，对于地处海岛的国度来说，脾胃伤食之病频发，腹痛恐怕是日本自古高发的病症。日本人对腹部的关注直接影响了其医学流派的生发，从诊断到针治，都延伸出专门针对腹部的方法。而对诸种腹疾及虫病效用良好的万病圆，也因此广受欢迎，从而与「紫雪」和「鸟犀圆」并称，有加贺藩「三味药」的美名。（[日]日吉芳朗《加賀藩にゆかりのある史跡と産物》，《化学と教育》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再如以进口芳香药物（香药）为主要组分的苏香圆，是在中医名方「苏合香丸（圆）」基础上制成。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三中，苏合香丸是用于治疗「一切气」病的首方。根据清宫脉案记载，西太后（慈禧太后）患有面瘫、消渴、肝郁、经闭等症，就使用过苏合香丸，借助其辛香走窜之性，以利气道经络，治疗气滞血瘀、络阻窍闭。（陈可冀《清宫医案集成·下册》，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九年，页一二九五）而根据冈本玄治所著《家传预药集》中的记录，苏合香丸有顺气化痰的功效，可用于治疗骨蒸、烦劳、卒暴、心痛、鬼魅、瘴虐、赤白下痢、小儿惊搐等多种病症。其组分有沉香、丁香、木香、白檀、茖芨、安息香、辰砂、犀角、香附子、白术、诃子、麝香、龙脑、熏陆（乳香）、苏合香油等十五味，炼蜜成丸。（[日]宗田一《「雍州府志」にみる17世紀の成薬》，《医学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五期）在组方配药方法上，日本基本沿袭了中国的苏合香丸原方。且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中，苏合香丸不仅可以内服，还有「用蜡纸裹一圆，如弹子大，绯绢袋盛，当心带之，一切邪神不敢近」之功效的说法（《官刻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上册）》，燎原书店，页二〇八），这大概是苏合香丸有治疗鬼魅功效之说的缘起。而到了江户时代，苏合香丸成了贵族武士放置在印笼中的

阅读链接

“耆婆万病丸”的适用病症

◎ 治七种癖块，五种癫病，十种疰忤，七种飞尸，十二种蛊毒，五种黄病，十二种水病，八种大风，十二种痹，并风入头，眼暗漠漠，及上气咳嗽，喉中如水鸡声，不得卧，饮食不作肌肤，五脏滞气，积聚不消，壅闭不通，心腹胀满，连及胸背，鼓胀气坚结，流入四肢，或腹叉心膈气满，时定时发，十年、二十年不瘥。五种下痢，疳虫、蛔虫、寸白虫诸虫。上下冷热，久积痰饮，令人多眠睡，消瘦无力，荫入骨髓，便成滞疾，身体气肿，饮食呕逆，腰脚酸疼，四肢沉重，不能久行久立。妇人因产，冷入子脏，脏中不净，或闭塞不通，胞中瘀血冷滞，出流不尽，时时疼痛为患，或因此断产，并小儿赤白下痢，及狐臭、耳聋、鼻塞等病。

——[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之八“治杂病·耆婆万病丸”

贴身药品，或许其在某种角度上继续扮演了护佑主人健康平安的护身符的角色。在出版于一九三三年、由石原保秀译注的《救急皇汉医方》中曾提及苏合丸一方，并释为「即苏合香丸」，并可用于对缢死者的急救。由于苏合香丸成分中含有许多具有通窍醒神作用的挥发性芳香药物，可以祛风镇痛，通窍除痰，既可用于特殊情况的急救，如中风、昏迷等，亦可用于缓解日常病症，如小儿受惊，腹痛吐泻等。因此，苏合丸亦是清宫帝王的爱用药，从清宫定期向同仁堂采买订购的成药清单中即可见到。甚至在庚子之变两宫出逃期间，苏合丸在两次补购药品清单中都榜上有名（关雪玲《清代宫廷医学与医学文物》，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八，页一二七、一二八），足见其宫廷日用常备药品的地位。

成药的历史可追溯至北宋时期「熟药所」的成立。其后，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成药「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问世，正式开启了中成药「标准化」、向百姓广泛售卖的新篇章。而另一方面，随着诸多医方书籍与制药技术的东传，日本汉方医学也逐渐打开了「卖药」的新领地，成药制作与售卖逐渐成为汉方药舞台上的主角，影响深远至今。

现在，让我们合上印笼的小盖子，看看除了其中盛放的药品外，这种随身装备药物的习俗又有着怎样的渊源与流转。



清　苏合丸
故宫博物院藏

贴身佩药保平安

如今无论中药还是西药，药物已然高度商品化，日常生活中如急需某种药品，人们大多可迅速在药店甚至网络上购得。即便出门在外，也大概不必为特殊情况下找不到药物而忧虑。但对于生活在信息、商品尚不通达的过去的人们来说，常备药物乃是生活必需，因而衍生了许多可以随身便携的药物。对古人来说，它们既是日常生活中预防疾病、避除病邪的吉祥物，亦是紧急时刻挽救性命的护身符。依循着随身配药的需求，古人创造了与之相关的丰富的物质文化。



清　五色编织络紫金锭香珠
通长三九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贴身佩戴药物，当然是取其便利之功，从药效上似可大体分为「未病先防」与「既病防变」两方面。而前者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典型表现。若想「未病先防」，服用一些代茶饮类药物固然可以，但相较于内服，借助某些挥发性药物的效用，通过气味熏散，提前预防疾病发生，可以说是对人体伤害程度更小、也更加简单的方法。尤其是暑热潮湿气候下，芳香药物有通窍醒神的功能，可有效预防中暑；同时，有些药物有刺激性味道，随身佩戴能驱散蚊虫，防止叮咬。其实，这些香气逼人的药物背后，是一段漫长的中国与其他国家药物通商往来的历史。由于中国并非香药的主要产地，因而长久以来，香药都作为古代进口贸易中的核心货品之一，从朝鲜、日本、东南亚、南亚或中亚、非洲运输而来。尤其至北宋时期，随着海上航路的拓展，进口香药数量惊人，并对北宋及其后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孟彭兴《论两宋进口香药对宋人社会生活的影响》，《史林》一九九七年第一期）也是由于香药贸易的繁华，海上丝绸之路亦名「香药之路」。

按照中医药性理论，芳香类药物性善走窜，故而有较好的通气作用。前文说到的几种放置在印笼中的成药，大多也含有香药成分。在清宫收藏中，亦有大量香药相关藏品，多为旧时宫廷中熏香所用。实际上，香药本身即可以经由加工，改变形制，成为贴身佩戴之物。在清宫外治医方中，有避暑香珠的记录，以祛暑药香薷，配合有清热解暑功效的甘菊、黄柏，善清热解毒的黄连、连翘，疏散风热的蔓荆子，以及祛风胜湿、芳香通窍的香白芷熬制而成，做成香珠形状。据说逢盛暑之时佩戴，可避暑气、瘴气。（陈可冀《清宫医案集成·下册》，页一八四七）

除了把芳香药物贴身佩戴之外，还可以将之放入其他精巧镂空容器中，发挥其功效。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各种材质的香囊。已有研究者提出，香囊原由佩囊发展而来，在其中放入香料，除了味道芳香，更是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文人雅性。甚至后来香囊的词义也得到扩展，不仅盛放香料者称香囊，很多盛放其他小物件的囊袋都被统称为香囊。（崔军锋，张建新《香囊的社会文化史——基于「礼制」与「民俗」视角的考察》，《中医药文化》二〇



清　四色香
故宫博物院藏

一六年第六期）到了清代，香囊的形制与设计更加多样，从故宫的大量精美香囊藏品即可推知，它们在当时应是帝王妃嫔的爱用品。普遍意义上的香囊，是以丝绸锦缎缝制的小布包，清宫藏品中亦有此类。然而，帝王家用的香囊更是多用名贵材料打造而成。如以白玉、碧玉等天然玉石双面镂雕出各种纹样的香囊，还有以金丝盘绕编织、镶有各种宝石小珠的金香囊，此外尚存有象牙雕镂空香囊等。有些香囊则采取了寿字纹样或葫芦形状等富有健康吉祥寓意的设计，工艺不吝繁复。

较之日常佩戴的普通香药、香囊来说，锭子药的药效则似更为峻猛。随着近年来故宫文化的普及推广，锭子药几乎成为清宫医药的明星藏品。其中最有名的应是「太乙紫金锭」，方含化痰散结敛疮的文蛤、大戟，解毒消痈的山茨菇，加治皮肤疥疮癣疣的千金子，另有常用于「安宫牛黄丸」「六神丸」等急救药或解毒药中的朱砂、雄黄、麝香等。既可在夏季日常佩戴，驱避蚊虫；亦可在体表敷用，治疗皮肤疥疮、叮咬伤痛；甚至在中风、瘟疫急救中可调和内



清　金镶珠石累丝香囊
长七・二厘米　宽五厘米　厚二・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象牙雕镂空葫芦式香囊
长六・七厘米　宽二・八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　白玉透雕莲花纹香囊
高八・九厘米　宽七・三厘米　厚二・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服。由于锭子药的药效奇佳，还方便携带，曾作为皇帝对行军于湿热偏远地带士兵的赏赐。（关雪玲《清代宫廷医学与医学文物》，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八年，页一八一、一九七）清宫其他种类的锭子药也多为针对夏日虫毒、湿热、昏扑等病症的效验方，体现出古人对佩戴药物祛秽辟邪信仰背后的现实原理。

隐没在清宫浩瀚收藏中的印笼，本为一件不起眼的和风小盒子。但观其内外的历史，却是别有洞天。因于对古老唐土文化的崇尚与追随，日本创造出印笼这一特殊的文化标记，乃至成为在生活史与医学史之间搭接的桥梁。而印笼本身，无论其内容的药物，抑或悬挂腰间佩戴的形式，都糅杂了复杂多元的文化内涵，也处处显现出古代人们对于保持身体康健的智慧与信念。如今再回看这些藏于深宫百余年却风采未减的精巧器物，或许会体味到其创造者匠心之间交织的悠远厚重的文化意涵。（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物质文化视角下的中医传日与江户时代医学流变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BZS084）

致谢：本文为作者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任外国人研究员期间完成，研究过程中，日文研图书馆馆藏资料及宗田文库藏书是本文重要文献来源；感谢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副馆长李维、日文研安井真奈美教授对笔者有关印笼研究的指引与启发；感谢《紫禁城》编辑黄婵媛对本文的邀约以及图片资料收集中的大力协助；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赵京生教授在本文修改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

